

《四库全书总目》  
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

赵涛 著



● 河南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四库全书总目》 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

赵涛 著



● 河南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 / 赵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1  
（河南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8979 - 5

I. ①四… II. ①赵… III. ①《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  
②《四库全书总目》—方法论—研究 IV. ①Z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434 号

|       |     |
|-------|-----|
| 出 版 人 | 赵剑英 |
| 责任编辑  | 孔继萍 |
| 特约编辑  | 邹 莉 |
| 责任校对  | 朱妍洁 |
| 责任印制  | 李寡寡 |

|       |                       |
|-------|-----------------------|
| 出 版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 邮 编   | 100720                |
| 网 址   | http://www. csspw. cn |
| 发 行 部 | 010 - 84083685        |
| 门 市 部 | 010 - 84029450        |
| 经 销   |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      |                    |
|------|--------------------|
| 印刷装订 |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
|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开 本 | 710 × 1000 1/16 |
| 印 张 | 28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449 千字          |
| 定 价 | 102. 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籍目录集部学术源流及其文学影响研究”(13BZW089)阶段性成果
-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2016-CX-028)资助成果
-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资助



## 序

清袁枚《随园诗话》中有一节，云：

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樞闌，类书如櫥柜，说部如庖湍井匱（排水沟渠之类），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会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

袁枚，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十三年（1748年）即辞官居随园。《四库全书》开馆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十年，书成。袁枚虽与乾隆在位相始终，但《四库》书成，并不及见。他这段话，一是说个人置书，二是说读书。书的重要性，大体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读书自然也是先“正寝”，次“厅堂”，然后“东西两厢”。置书有正寝、有东西两厢、有门户、有櫥柜、有厨房浴室及排水之沟、有书房花园，何其幸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成，藏在官府秘阁，一般读书人仍不易得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批评生童不知读书，生童问他应该读何书，张一口气说出二千二百余种书籍，还说：“诸生当知其少，勿骇其多。”这就是张之洞编辑《书目答问》的由来。其后，《答问补正》、《四库答问》之类的书就渐渐多起来。这些书如同《四库全书》书目的简编，对读书人有导引作用。不过，如要真正领略《四库》之大概，还是不如去读《四库总目提要》，来得快捷方便。《总目提要》与《四库》同年书成，近人任松如云：“（《总目》）每目之下，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姓名、爵里，可以一览了然”。清人王鸣盛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



明，终是乱读。”就是这个意思。

2004年，我已经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最后一届研究生也送出了门。学校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点招进了第一位文献学方向博士生，就是从河南大学考入的赵涛君。当时，每一位博导尚无带文献学方向博士生的经验，或即使从事过文献学的相关研究，却又一时无法分身，院领导就约谈我，让我帮助赵涛选一个文献学方向的博士论文题目，并协助赵涛把论文完成。我虽然做过李白、韩愈两家集子的校勘、注释工作，为了应急，读过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及《书目答问》之类，纪昀领衔的《四库总目提要》偶尔翻过，因为不是急切要用，仍是不得要领。退休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案头工作，毕竟“今日得宽馀”，于是选读了六七种南京大学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读的第一本竟然是《纪昀评传》。读《纪昀评传》的目的，在于了解这位乾隆之世号称“学问掩通，于书无所不读，持论简而明，修辞淡而雅”的大学问家，并借此了解《四库总目》编纂情况。

《评传》中关于总纂官纪昀处理分纂官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四家分纂稿一节引起我极大兴趣。分纂官翁方纲、姚鼐等皆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然而他们写就并提供给总纂官的分纂稿，到了纪昀手里，却被大肆删削修改甚至废弃不用。以翁方纲为例。翁氏所纂集部提要分纂稿共四百三十篇，除去《总目》中少数未著录的篇目外，为纪昀（应主要是纪昀。因为总纂官还有陆锡熊）废去不用的篇目为一百七十四篇，占百分之四十，全部采用者仅十七篇，不足百分之四，其余一百五十余篇均有大量改动。姚鼐所纂集部提要较少，约三十四篇，被作为“废稿”弃去不用的比例大致与翁方纲同。邵晋涵、余集所撰集部分纂稿今存甚少，不计。我也曾作为几部书的主编，撰稿者或为弟子，或为年轻教师，稿子来了，作为主编的我，不免要看、要改，理路不通、文字太差的稿子也要废弃不用另写。然而我的主编身份与年轻的分撰者身份远不同于纪昀与翁、姚之辈。翁方纲、姚鼐何许人也？翁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较纪昀进士及第早两年，官至内阁学士，精于考据、金石之学，研读群经，是清代著名学者。姚鼐中进士虽晚，然年辈并不晚于翁、纪，是“天下文章无出其右”的桐城派主将，为文“奄有义理、考据、文章”之长，力主文章须三者并举，净洁渊雅，天下奉为宗师。然而翁、姚的文章，却不被总纂官纪昀看好，原因在哪里？其中必有更深刻的道理，



是学术而非简单的文字、理路等。

读书至此，心中略有所会。适当其时，赵涛君来舍下，商量博士论文题目的设计。我于是以《评传》相赠，并将我的想法告诉赵涛君：第一，论文题目的选取，要看是否有“可持续研究之可能”，如果一个题目做完了，不能再做延伸、扩展研究，就不是好题目，而《总目提要》应该就是一个可持续研究、可扩展研究的题目；第二，论文题目的选取，还要看是否有“学术点”，纪昀《总目提要》与翁、姚、邵、余四家初纂稿的不同，循此线索而下，深究之，应该有“学术点”可获取，得出结论，即有成果；第三，《四库》与《总目》，二者相伴而生，一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总集，一为有史以来最巨的目录学著作，《总目》集目录学、文献学之大成，借此番研究，足以打好文献学的基础，终生可享用不尽。赵涛君来自中原，是谨厚君子，如司马迁《李将军列传》所说的“悛悛如鄙人”的李广那样，对我说的一番话，频频点头称是，并无异议。论文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

赵涛一边在学院里听导师们上课，一边即开始收集资料，准备论文写作。很快，关于论文题目，赵涛那边的意见就反馈过来了。很难做。我原先没有估计到，而我原先应该能估计到。题目难就难在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赵涛的知识和学术积累；岂止远超赵涛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也远超我的知识与学术积累。翁、姚四家的分纂稿，以翁、姚最多，翁分纂稿今存二十五卷、九百余篇；姚分纂稿今存四卷、八十八篇。分纂稿不仅包括集部（即诗文部），还包括经、史、子部。即以集部而言，翁的分纂稿共四百余篇，上自楚屈原《离骚经》，中间如唐《寒山诗集》、《储光羲诗集》、《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宋杨亿《武夷新集》、黄庭坚《山谷内、外集》、杨万里《诚斋集》……下迄元、明、清诸诗文集，分纂稿时间跨幅之大，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想象，然皆为《总目》最后定稿所弃用（严格讲可以说为博学淹通古今的纪昀所弃用）并重撰。为《总目》弃用的姚、邵、余诸家分纂稿，亦不在少数。其中深蕴的缘由，以赵涛的学力如何能应付得过来？集部皆诗文集，或者还可以据以往的文学史知识有所依傍，景况或许会稍好一些，其他经、史、子部，涉猎面更广，赵涛的学力更是难以应付下来的。经部，如翁方纲所纂明陈士元《易象钩解》、宋陈抟《周易图说》等分纂稿；史



部，如姚鼐所纂元虞集《平遥记》、宋朱熹《伊洛渊源录》等分纂稿；子部，如姚鼐所纂宋杨简《先圣大训》、汉扬雄《太元经》等分纂稿，皆为纪昀《总目》所弃用，其中学术流派的、历史主流意识的、时代文化氛围的，以及清朝贵族入主中原后对汉民族的高压政策带来的一波一波掀起的恐怖文字狱的……，缘由就更复杂了，断断不是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所能应对的。总而言之，一方面，我意识到交给赵涛的题目仍然是个大题目，是“富矿”，因为那段时间我恰恰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傅璇琮先生的一篇短文。文章说，最近有一位大学者，撰文说乾隆修《四库》，集中全国学者几千人，其中参与者有卢文弨。卢文弨是清代大学问家，名气很大，以卢的学问，参与修《四库》是有可能的。于是傅璇琮先生遍查清廷“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无卢某人；再作一番卢某生平考证，结论是在《四库》编修的十年间，卢辞官归里，“林居余二十年”，并不在京，故不可能参与《四库》编修之事（文章后收入傅先生《濡沫集》中，题目是《卢文弨与〈四库全书〉》）。傅先生文章虽小，题目不大，但做出文章来很有意思，令人读了颇有兴味。学术界，堪称“学”的有“选学”、“敦煌学”、“红学”。有人将《红楼梦》比作宝山，意思是但入宝山，其中一草一木都会成为学问的素材，俯拾即是宝贝，绝不会空手而归。《总目》也堪称“学”，堪称“宝山”，进入《总目》这座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归。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交付给赵涛的这个题目，难度确实太大了。如果赵涛君此时打退堂鼓，更改题目，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会与他“另打锣鼓另开场”。

然而，志诚、谨厚的赵涛君却未言退却。他经过一番缜密细致的思考，对论文的规划提出了全新的设想。以《总目》与四家分纂稿进行比勘这个基本的途径是不变的，在比勘中实现论文的要旨，即他在论文“绪论”中提及的三点。

第一，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研究，探究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渊源，特别是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第二，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探究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关系，尤其是与乾嘉学术思想之关系；

第三，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深入探究纂修官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的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总目》的学术价



值，推进“总目学”的建设和发展。

在赵涛看来，《总目》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是纯粹的文献学研究，二是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总目》的学术特征并不仅限于文献的领域，在学术史、文化史领域，尚有广阔的开发空间。我欣赏赵涛君迎难而上的态度，也赞赏他由学术、文化的视角处理《总目》与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关系的研究方法。如此一来，不但使自己不深陷于文献纷扰纠结之中，又可以暂时避让因为自己文献知识方面的缺失带来的疏漏。这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赵涛君关于论文设想的第三点，即“推进‘总目学’的建设和发展”。自《总目》编纂问世，由张之洞为生童所编《书目答问》，至于范希曾《答问补正》，都无例外地将《四库》及《总目》视为指导生童读书及校勘考据门径的工具书。将《总目》视为工具、门径，当时和今时的学人，大体的认识如此。不但将《总目》视为工具书，而且视为极具时代学术文化特点的“学术著作”，并由此着力研究它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赵涛君的研究亦是如此。

将文献的比勘转化为学术文化的探求，这当然不是捷径，这仍是一条需要艰苦跋涉的路，需要坚韧、锲而不舍的毅力，需要对当时历史及学术环境下主流的与非主流的学术思潮的了解和宏观的思考，至少也是扬长避短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

以上三点，尤其是前两点，看起来似乎都有些“空阔”。待到2007年寒假前，赵涛君将打印的四十余万字论文初稿拿到舍下来，掂量着厚重的论文打印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赵涛君寒往暑来数年的“惨淡经营”，忠诚、谨厚的赵涛君不但未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而且努力攻克了横亘在面前的经、史、子、集四部“大山”。

我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攻读”（说是“攻读”，一点不假，因为从翁、姚、邵、余分纂稿到《总目》稿，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全新的知识。我作为一个旁读者，不过时时能保持发现“异端”即论文偶有的疏漏的警惕心，随时予以指出罢了）赵涛君的打印稿。拜读一过，我原先所谓对论文“空阔”的担心，都成为论文里具体的文字实践。例如，论文对乾嘉时期经学思想与方法论进行了深入而极富思辨性的分析，概括了乾嘉经学的流变与蜕变，是以“汉学复兴”、“疑古、考证学风泛起”、“返经汲古的复古思潮”、“经世之风渐渐显露”等为特点，而《总



目》的总纂官纪昀（主要是纪昀）对翁、姚等当世名家分纂稿的弃用并重撰的原因，即是基于以下的学术理念与旨趣：指导思想的独尊儒学；学术思想的崇汉黜宋；学术方法的注重考据。如重文字训诂、重考证有根底、重实事求是、不妄下己意、避免了宋学的“空疏”、“穿凿臆断”，如此一来，分纂稿与《总目》总纂官（纪昀）的学术分野，判然有别，《总目》的学术价值，纪昀的文化观也一目了然。经部以外，论文对《总目》与翁、姚等史、子、集分纂稿的思想研究与探析，也分别从学术史、文化史的视角，予以论述。如集部，论文也是先对乾嘉之际文学思想的嬗变作宏观辨析，然后再对翁、姚等分纂稿与《总目》进行对照比勘。论文认为，乾嘉时期文学思想发生的变化，约而言之，即“文学观念复古”、“尊唐远宋、弥合唐宋诗之争”、“文学思潮猛烈批评陆王心学，走向实学化”、“注重考据学”等，由是带来《总目》提倡“书写性灵”、主张“缘情绮靡”等倾向。如此一来，整个论文就显得充实而博大了。

论文在详细比勘翁、姚、邵、余四家分纂稿与《总目》之异之后，对《总目》的学术价值做出的高度评价，不具引，见论文的“结语”部分。论文对《总目》也并非一味“高评”，例如对《总目》出于“汉学派”门户之见过于指斥宋学的流弊，也有论述，对作为清统治者一面炫耀文治、一面禁锢思想、扼杀学术的反动倾向，也有深刻的揭示。

赵涛君完成论文并顺利参加完答辩后，返回他的母校河南大学。论文再经数年反复沉潜精研，修改定稿为三十多万字的专著，即将问世。在此期间，赵涛君另有关于《总目》的单篇学术论文不断在刊物上发表，其学术成就已经广为业内人士所熟知。论著即将出版之际，赵涛君邀我作序。我通读了赵涛君修订后的论著，索要了他发表的相关论文，打算对赵涛君取得的学术成就做一番评介，但下笔之际，仍旧觉得对于包容极大、覆载极广的《总目提要》，以及赵涛的研究，自己仍然是门外汉，评介云云，且留给世人。作为赵涛撰写论文的“在场者”，我愿意写下这个过程，对赵涛君的辛劳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为这部著作的序。

阎琦

2015 夏初

谨识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 目 录

|                          |        |
|--------------------------|--------|
| 序 .....                  | 阎 琦(1) |
| 绪论 .....                 | (1)    |
| 第一章 《总目》纂修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 | (21)   |
| 第一节 《总目》产生的学术基础 .....    | (21)   |
| 第二节 《总目》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8)   |
| 第三节 《总目》产生的学术思潮 .....    | (49)   |
| 第四节 《总目》产生的实体条件 .....    | (62)   |
| 第二章 《总目》的纂修与学术思想趋向 ..... | (74)   |
| 第一节 《总目》的编纂与作者考辨 .....   | (74)   |
| 第二节 《总目》与分纂官分纂提要 .....   | (93)   |
| 第三节 《总目》的思想取向与学术理念 ..... | (110)  |
| 第三章 《总目》的经学思想与方法论 .....  | (142)  |
| 第一节 经部发展流变与乾嘉经学的蜕变 ..... | (143)  |
| 第二节 《总目》的经学思想 .....      | (151)  |
| 第三节 《总目》的经学方法论 .....     | (176)  |
| 第四章 《总目》的史学思想与方法论 .....  | (190)  |
| 第一节 史部发展流变与乾嘉史学的重构 ..... | (190)  |
| 第二节 《总目》的史学思想 .....      | (197)  |



|                            |       |
|----------------------------|-------|
| 第三节 《总目》的史学方法论 .....       | (225) |
| 第五章 《总目》的诸子学思想与方法论 .....   | (245) |
| 第一节 子部发展流变与乾嘉诸子学的复建 .....  | (245) |
| 第二节 《总目》的诸子学思想 .....       | (255) |
| 第三节 《总目》的诸子学方法论 .....      | (274) |
| 第六章 《总目》的文学思想与文体批评 .....   | (291) |
| 第一节 集部发展流变与乾嘉文学的嬗变 .....   | (291) |
| 第二节 《总目》的文学思想 .....        | (298) |
| 第三节 《总目》的文学批评与小说批评 .....   | (330) |
| 结语 .....                   | (356) |
| 附录一 四家分纂稿与《总目》的著录比勘 .....  | (362) |
| 附录二 同种书不同分纂稿与《总目》的比较 ..... | (396) |
| 参考文献 .....                 | (421) |
| 后记 .....                   | (435) |



## 绪 论

《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简称《总目》)<sup>①</sup>,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古代历史上规模宏大、体制完善、编制出色的一部集大成的目录著作。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官府组织纂修的目录学著作,《总目》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四库全书》的解题目录。它继承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sup>②</sup>,汲取了自西汉刘向、刘歆以来古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较为完备的分类体系,提要、大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晰评鹭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类古籍,系统考察、总结了清乾隆以前历代学术的渊源流变,在古典文献学和古代目录学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清代目录学家周中孚认为:“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编矣”<sup>③</sup>,肯定了《总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张之洞指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sup>④</sup>,强调了《总目》的学术价值和指导学术门径的作用;余嘉锡亦认为:“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

---

① 参见永瑤等纂《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本书所引都是该版本，以下书中注释皆从略。

②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

③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7页。

④ 张之洞撰，司马朝军校注：《輶轩语详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sup>①</sup>，指出了《总目》的学术成就和价值。这些都是对《总目》学术价值的肯定和推扬。

可以肯定，《总目》不仅是中国古代目录编纂的里程碑，而且是中国传统学术批评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它又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经典著述，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研究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然而，自《总目》产生以来，学界研究《总目》，大多将其看作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其学术价值亦仅限于“卷第之繁复，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而对于它的“议论之公平”和“瑕瑜不掩”则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更遑论从思想史、学术史角度去审视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总目》这种提要目录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著作，其目录学价值只是一个层面的学术现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看《总目》，便会发现，这是一部体系庞大而又十分精审的学术史著作，其著录或存目古代典籍，皆出于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旨趣，所体现的是乾嘉时期学术文化界对两千多年来学术发展的总结与批评，鲜明地反映出清代前期学术文化界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观念，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基于此，本书把关注点与着力点放在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上。

### 一 问题的提出

《总目》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本初稿问世之后，即受到广泛关注，对《总目》的整理和研究也随之展开并向纵深拓展。迄今为止，《总目》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历程，其间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回溯《总目》研究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推动《总目》研究的不断深化、开拓发展大有裨益，并且是本书研究问题提出的出发点和原因所在。

纵观《总目》的研究历史，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段。

《总目》问世至清末，此为《总目》研究的初始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四库全书》编成。此后近八年的时间里，随着《四库全书》不断抽换和完善，《总目》也随之修改，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

<sup>①</sup>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才始定稿，并由武英殿刻印。早在殿本刻版印行前一个月，浙江的地方官府就根据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内的原抄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刊刻，由此，《总目》得以广泛流传。由于《总目》为钦定，绝大部分学人不敢涉足这一研究禁区，所以此一时期研究《总目》仅是放在纠谬补续以及条纲系目上，拘于纠补续，且尚呈散在式，大量有价值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各种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中。但较大价值的研究也时有出现，如阮元在嘉庆四年（1799年）仿《总目》体例，撰写四库阙书提要，编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又称《擘经室外集》，共五卷，对四库未收书提要进行补撰。姚觐元在光绪八年（1882年）把搜集到的几种禁书目录合并入《咫进斋丛书》中，编为《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所收全毁、抽毁书籍，总计达二千六百一十一种。孙星衍亦仿《总目》形式，先后撰成《廉日居藏书记》与《平津馆鉴藏记》。周中孚编纂的《郑堂读书记》，也从《总目》中汲取了营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为《总目》条纲系目，取得很大成就。清道光以后，清廷开始衰落，学术界对《总目》的态度发生分歧，“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sup>①</sup>，如方东树撰著《汉学商兑》，对汉学大加鞭挞，指责《总目》的缺失。光、宣年间，有《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版。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研究成果少，只能视为《总目》研究的准备阶段。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此为《总目》研究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较清一代，对《总目》进行研究的名家众多，内容广泛，成果丰硕，水平较高，取得了丰富卓著的成就。如孙德谦、余嘉锡、陈垣、胡玉缙、钱穆、王重民、郭伯恭、张舜徽、黄云眉等，其中余嘉锡、胡玉缙、陈垣的研究最为突出。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总目》的两部重要专著，“皆所以为提要而补阙纠谬者也”<sup>②</sup>。余嘉锡倾毕生精力，对《总目》近五百篇提要进行详核考辨补正，编成《四库提要辨证》，该书对史、子、集三部用力颇多，对经部关注较少，但成为此期研究《总目》的经典之作。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② 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卷首《自叙》，台北华正书局1980年版，第3页。



胡玉缙呕心沥血撰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去世时仍未完成，后经由王欣夫认真整理，最终编定出版。此书依《总目》次序，分别补正两千零九十二种书目，“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sup>①</sup>。陈垣曾通览《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第一个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者”<sup>②</sup>，对《总目》研究亦有较大贡献。他倡议影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考证《于文襄公论四库全书手札》，“发现了自《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的书，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周亮工《读画录》等的残本”<sup>③</sup>，撰写的《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也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孙德谦的《四库提要校订》、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任松如的《四库全书答问》、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刘国钧的《四库分类法》、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等，或介绍研究状况，或进行纂修、辨证、辞典、学术等方面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遵循传统治学路子，如版本、目录、辑佚、校订、考证等，但也偶有新式西方治学方法的运用，如引得、实证以及学术史研究。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就是此一范例，首先把学术思想的讨论引入《总目》研究。可以说，此期研究成果最大特点是对《总目》的考辨纠补。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为《总目》研究的低落期。祖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总目》研究稍有进展，但是有些缓慢。“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总目》研究则完全沉寂下来。这一时期成果主要是余嘉锡修订出版了《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在此时期出版。此外，王钟翰的《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论〈四库全书总目〉》，周鼎的《试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我国目录学中的价值和影响》及刘汉屏的《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总目》的力作。王钟翰的《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经过详核考证，辨证了中国营造学社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

① 胡玉缙著，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首《出版说明》，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② 刘乃和：《陈垣对〈四库全书〉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

③ 刘乃和、周少川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明目录”为伪本。王重民于1964年发表《论〈四库全书总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总目》的形成过程、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同时期有关《总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刘汉屏的论文《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以《总目》前后内容的差异，论证清代前期学术思潮的流变。以上研究，既有传统的考证，又有对《总目》的社会背景、学术思想展开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广度和深度。此一时期的成果较少，但也为《总目》研究的新时代来临作了学术上的铺垫。

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目》的研究又渐成热潮，是为《总目》研究多元繁荣时期。此一时期《总目》的补正、订误、目录、版本、考辨传承传统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仍在不断延续研究的繁荣景象。此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辨证名著，一是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另一是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崔氏的《补正》专注版本考核，注重查考补抄本底本，“可相互配套使用，而古籍校理之端绪已密”<sup>①</sup>。李氏的《订误》主要弥补《总目》考证未详处，同时对余嘉锡著述进行改错纠谬。此外，利用《总目》提要、分纂稿等不同文本进行研究，也是此一时期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发掘文献竭泽而渔，对分纂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与《总目》提要进行详核比对，全面揭示两种不同文本差异；罗琳的《〈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一文认为“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可以从中领略到清代乾嘉时期诸儒不同学术风格和其专精所在；黄爱平撰著的《〈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异同初探》一文从总体上把握三阁提要异同，认识到《总目》提要优于其他各类提要价值。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仅对《总目》的编纂、分类、著录进行了考证、辨析、纠谬、补缺，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对《总目》的价值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全新探讨与研究，诸如对《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重估、文风观乃至研究方法等的研究，呈现出面目一新的局面，将《总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周积明在《总目》的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研

<sup>①</sup>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卷首《序》，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